



编者按

免去“万里挑一”(10001元)的彩礼;骑行山地车带着新娘子“低碳出嫁”;在草坪上办一场自己主持的婚礼……这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近在一些地方采访乡村青年婚恋话题时的见闻,从中看到,乡村振兴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创业、兴业,而这些返乡的青年人也为乡村带来移风易俗新风尚。走访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怪现象——个别地区仍存在高彩礼现象,“闪婚”“闪离”困扰部分年轻人。

青年婚恋问题是小家的事,更是国家大事。《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把青年婚恋列为青年发展的重要领域。各级共青团组织更把解决婚恋中年轻人的急难愁盼当成重中之重。

婚恋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我们呼唤卸下爱的负担,让婚俗改革的新风吹遍田野。



合肥市包河区打造的婚俗文明新风宣传墙。

合肥市包河区委宣传部供图

返乡青年成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尚主力军——

新乡村青年带来新婚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焦敏龙 王豪 田宏伟

今年5月4日,28岁的吴伟迎来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和相识、相恋4年的女友万丽清结婚。这是一次“特殊”的婚礼,小两口作出简化结婚仪式的决定——免去当地“万里挑一”(10001元)的彩礼习俗;从原本计划在大饭店摆35桌婚宴,改为在村内菜馆邀请10桌当地的亲朋好友;“婚宴”饭菜以家常菜、健康饮食为主,争取“光盘行动”……

让吴伟欣慰的是,自己简办婚礼的想法得到朋友和同事的支持认可,大伙儿都觉得这是一种新风尚。

在家乡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晓星村,吴伟经常看到社区楼栋和小区电子屏上播放拒绝高

额彩礼、提倡婚事简办等主题宣传内容。作为村里团员志愿者,他定期上门向村民宣传婚事简办的新观念。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合肥包河区在全区500多个居民小区常态化开展“新婚喜事庆贺到家”活动,自觉抵制铺张浪费、随礼攀比;在婚姻登记大厅打造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婚俗文化墙,设立幸福殿堂、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区,打造集简约仪式、情感辅导等功能于一体的婚姻服务驿站。

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婚俗改革,持续推动“为爱减负”。在乡村振兴中,一大批返乡青年成为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尚的主力军。

骑行山地车带着新娘子“低碳出嫁”,和朋友们发挥爵士鼓、演唱等才艺,来一场即兴演出……90后胡文鑫(化名)和妻子刘敏(化名)的田园风婚礼曾被上传至短视频平台,收获一大波好评。

胡文鑫和刘敏都在北京工作,回老家办婚礼前,就商量着改变一些仪式习俗。他们对自己婚礼的安排是“不请吹鼓手‘热闹热闹’、不安排车队上门娶亲,婚礼现场不展示陪嫁物品,酒席上的菜品和烟酒饮料都选择经济实惠的……”

起初,胡文鑫的父亲持反对意见,刘敏母亲也认为这样不妥。胡文鑫向父母解释,刘敏是位崇尚环保的女孩,这些想法是他们两人达成的共识。刘敏宽慰父母说,习俗仪式是喜庆庆祝的,只要大家开心就是最好的安排。

婚礼当天,胡文鑫和刘敏把借来的100多把椅子摆放在宾客的草坪上,二人互相配合主持仪式,向来宾分享他们相识相爱的故事,收获了亲友们的祝福,婚礼氛围令人难忘。

推动移风易俗,正在形成合力。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千城乡富民新村,新建的富民一老一幼关爱服

务中心食堂成为新人办婚宴、招待宾客的新去处。

村两委牵头成立红白理事会,提倡婚事新办办。“彩礼宜控制在4万元以内、婚嫁不搞豪华车队,婚礼车队不超过6辆、不在道路两旁乱贴红纸,提倡悬挂中国结等可重复使用的纪念品”等成为新风尚。

来自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民政局的数据显示,当地的离婚率近年来趋于下降。古浪县民政局副局长俞元芹分析说,这与民法典中“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有一定关系,也与近年来乡村青年婚俗观的改变有关系。

青年婚恋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提出,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支持开展健康的青年交友交流活动,重点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体的婚姻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

结婚记

□ 杨敏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朱娟娟

作为一名婚恋问题研究学者,马浩宇见证了弟弟、弟妹从相亲到结婚的过程。

马浩宇来自安徽一个农村家庭。2020年1月,弟弟和弟妹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见了面。其后是“相家”,即女方第一次正式拜访男方父母,也是女方亲戚到男方家的一次考察,这是双方亲戚对最终能否成婚的重要考量依据。因而,一场宴席少不了,一个大红包少不了。

房子是双方家庭讨论的重点。马浩宇家当时因拆迁,安置房还没有确切消息。双方商讨的结果是男方在县城南部购买一处在建小区的房产作为新房。

2021年年初,按照当地“下礼”习俗,男方准备了6种饮品各6箱、半只猪、一麻袋白糖、一麻袋红糖、6万元现金红包以及烟花爆竹。“下礼”过后进入“彩礼”环节,这也是在婚嫁支付成本中占比最高的部分。除了16万元的现金红包之外,男方准备了10种礼品各10件、烟酒、一只羊、烟花爆竹等,于婚前4天送至女方家。这个阶段,男女双方的结婚意愿已经确定。

接下来,婚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男方携女方及其女性长辈购置“三金”或“五金”。2021年年末,双方举办了婚礼。此时马浩宇家的拆迁安置房已分配下来,弟弟得到一套,而在城南购买的新房并未使用,却给弟弟增添了一笔贷款。

马浩宇发现,弟弟从相亲到结婚,人情支出中的礼品和礼金是巨大的“面子工程”。男方购置的礼品规格远超出一般家庭。

在农村也有解决之道。男方购置礼品时会和超市达成一致:作为“下礼”或“彩礼”的这些礼品可以退货,但存在一定差价,比如一箱牛奶的定价为70元,给超市时只按50元退。差价由男方补上,礼品退回超市后的钱则到了女方那里。这样的转换成为人情下的礼品铺张。

马浩宇的家乡有一句老话:“越往西,礼越重”。从县城往西,对礼品和礼金的要求呈递增之势。

其实,他家的这本“结婚账”,在农村地区并非个例。

他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曾针对全国21个省(区、市)开展农村婚恋问题调研。课题组在其他地区调研了解到,一些农村青年中学毕业后,倘若不继续升学,就一边打工一边趁逢年过节回老家相亲。由于男方打工收入一般,女方通常在结婚时提出高彩礼等要求。课题组在调研时发现,中部某省不少农村,近两年提出50万元彩礼并不鲜见。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卢丛丛发现,在老家豫南农村婚姻成本从10年前开始明显增高,现金彩礼、三金首饰、城市商品房是女方要求的基本项。近几年,婚前最低要求是当地县城商品房首付,现金彩礼一般是10万元左右,“三金”约3万元,还有订婚宴费(约两万元)、结婚酒席开支(约5万元)等其他开支。

“在传统婚恋观影响下,父母将孩子的人生大事看作自己的首要责任。在这种温情脉脉的代际亲情下,房子、车子、彩礼成为乡村爱情中躲不开的三座大山。”卢丛丛分析说。



2019年10月7日,甘肃省庆阳市一对新人在婚礼现场展示才艺表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合适比喜欢更重要”:西部农村青年婚恋观嬗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石佳

婚姻的变化,往往细微而悄无声息。甘肃省庆阳市一名婚姻登记工作人员通过离婚登记窗口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前些年,不少年轻人来办理离婚登记时,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甚至一言不合会动手,“近几年,这些情况少了。一些90后、95后办完离婚登记,双方还拍照留念、相约吃一顿散伙饭。”

“现在不少年轻人对待婚姻的态度表现得更有主见。”这名婚姻登记人员提到,由于外地工厂假期通常在每年腊月二十到正月十五左右,当地外出务工农村年轻人春节返乡后,会在家里长辈操持下,在20多天里完成结婚的一系列步骤。

这种快速建立起来的婚姻,有的并不牢靠。他介绍,近年当地年轻人离婚过程有所减缓,但“闪婚闪离”情况仍不少见。

“在老一辈人眼里,离婚是丑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离婚。”宁夏盐池县女青年杨阳说,现在的90后、95后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当婚姻“亮红灯”时,不愿意花太多时间费心思与对方磨合,也不愿意委屈自己、将就婚姻,“如果对方不能提供经济价值、情绪价值、陪伴价值,何不再找更合适的。”

“择偶首要标准是找到合适的人,合适比喜欢更

重要。”杨阳说。

如今,一些西部省份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普遍抱有“求稳定”的心态。这是记者在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走访时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28岁的王晓征在银川市一家物业公司工作5年。今年2月底,他用自己积攒的钱和父亲给的资助,付了购房首付,“现在年轻人相亲谈恋爱结婚,绕不开房子、车和票子三大问题。”

宁夏海原县女青年杨曼菁则记得,她母亲当年结婚时,只希望父亲家能有一台缝纫机,这样婚后就不用太辛苦。如今,她即将步入婚姻,按照她父母的要求,未婚夫在沙坡头区购置了一套三居室婚房。对于婚恋问题,他觉得“适当现实一点才稳妥”。

杨曼菁说,结了婚至少要在城区有一套房子,“要为下一代考虑,谁不希望孩子能在市里的好学校接受教育呢?”

鲁薇则把婚姻看成重要的“选择第二次人生”的机会。她在甘肃宁县农村长大,大专毕业后在当地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在她老家,男女青年相亲后的第一步,是双方父母各自找到共同的熟人,打听对方的家口碑。

如果男青年家住山区,意味着女青年嫁过去后的家务劳动比在平原地区生活更辛苦,因此会被索要更高的彩礼,作为给予女青年及其父母的补偿。“老家

山区的一些乡镇,嫁女儿的彩礼有要到近20万元的。”鲁薇说。

“农村有独院,不如城里有套房。”鲁薇说,在城里过日子,意味着下一代能在城市里有机会享受比县城、乡镇优质的教育资源。

工作也是婚恋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宁夏固原市一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年轻人对相亲对象的职业预期依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和央企国企工作者,“如果男方在私企工作,则会被认为‘还转着呢’(当地方言,意即工作不稳定——记者注)。”

热心的贺红梅退休5年来,一直在给年轻人介绍对象。她观察到,“微信相亲”成为当地年轻人新的相亲方式。不少年轻人对婚恋抱着“急也不急”的矛盾心态。

女青年萨娜参加过不少当地组织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但总觉得和接触的男青年缺少“来电”的感觉,活动结束后加了微信,“尬聊”了几次后不再联系。

她从重点大学本科毕业,考公“上岸”后又进修了在职研究生学历。工作8年,她从乡镇工作岗位被遴选到区直单位。随着工作向上提升,她向记者坦言,自己不甘心“向下择偶”。

(文中受访青年均为化名)



4月9日,内蒙古包头市单身青年男女交友联谊,制作永生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佳/摄



4月8日,内蒙古包头市6对新入举办集体婚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佳/摄



2019年10月7日,甘肃庆阳一对新人选择“低碳出行”式婚礼。

受访者供图

一本乡村生育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焦敏龙 田宏伟

女儿已经8岁了,李璐仍然无法忘记怀孕期间妊娠带来的痛苦。

这些年,为了给独生女儿解闷,她陆续养了3只猫。婆婆不理解,“怎么宁可养猫也不生二胎呢?”婆婆经常委婉地催李璐生二胎,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带孩子。但两年前,李璐偷偷去医院安了节育环,丈夫郁闷又无奈。

这一发生在某西部省份农村地区的故事,并非个例。

长期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永萍在题为《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的文章中提到,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与父辈的生育观念明显不同,其生育意愿有了更多因素的考量。

2014年至今,李永萍调研的足迹涉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数十个村落。她发现一种共性现象——除了江西、福建、广东等宗族文化盛行的地区,近年来,相较于过去“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农村地区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正在转变。

据李永萍介绍,团队访谈的“Y村”,是安徽省一个有着1700多人口的农业型村庄,青壮年多前往江浙一带打工。访谈得知,1985年之前出生的女性,“放开二胎”之后,只要公公婆婆用话语“压一压”,往往有可能“再生一个”,觉得“多生一个小孩好像也没什么”。但90后总体受教育水平高,考虑的因素多,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李永萍认为,在农村地区,生育主导权越来越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他们不完全像上一辈人“完全为了子女而活”。

访谈中,李永萍记录了一个85后返乡创业男青年对养育成本的考虑。这位青年谈到,以前老一辈养孩子就是“吃饱穿暖”,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90后返乡创业青年张勇考虑最多的是子女教育。他和妻子大多数时间在乡下做农产品电商。有时,他和妻子会商量,一个人到城里照顾孩子学习生活,一个人在乡下忙工作。

李永萍观察到,在农村,80后和90后父母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他们会将孩子送到乡镇乃至城里读初、高中,租房陪读、买学区房等现象由此产生。

她粗略计算过,加上房租、生活费、兴趣班学费等,一位母亲带一个孩子在乡镇、县城陪读一年的开销在两万元以上,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年轻人生育意愿变得谨慎,很大程度上和生育成本有关。”李永萍说,生育成本由抚育成本(养孩子)、教育成本和婚姻成本构成。此外,生育对女性身体、心理、工作等方面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

李永萍认为,婚姻成本背后的一大影响因素为彩礼。有些地方彩礼“标准”较高,如果一胎生的是儿子,夫妻俩会担心万一再生个儿子,将来婚姻成本会更高。

“要重视农村青年对生育成本增加的顾虑,以引导农村家庭释放生育动力。”李永萍建议,相关部门通过政策支持减轻和分担农村家庭育儿的压力,尤其是减轻生育行为对于女性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影响,不仅是经济上的成本,还包括时间和精力投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璐为化名)